

纪念《雨花》创刊 50 周年

《雨花》率先给“探求者”平反

在《雨花》当编辑

1979年《雨花》第4期,发表社论《探求无罪有错必纠》,率先给1957年被打成“反党集团”的“探求者”平反,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,为其后史学界的改正“右派”的工作开了先河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,开始深入人心。但在各个领域,解放思想的程度不一,思想观念也有差异,特别是在文学界这一“重灾区”,仍有一些人抱着传统的习惯思维和陈旧观念不放。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,一位“文革”前的文艺界领导人仍公开著文,说“文革”前的“五大战役”(批《武训传》、批《红楼梦研究》、反胡风、反“右派”、“文艺整风”)都是正确的、必要的;说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不对,但“文艺黑线”还是存在的;说“伤痕文学”是“感伤文学”,倾向不好;等等。文艺界尚未得到彻底的拨乱反正。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,江苏省文联党组决定顾尔镔同志担任《雨花》主编,与副主编庞瑞垠同志一起,办好《雨花》,拨乱反正,迅速繁荣江苏的文学事业。

顾尔镔同志上任不久,于1979年2月春节以后即和庞瑞垠同志和我(时任《雨花》理论组组长)一起,商量如何以《雨花》为阵地,做好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工作。他说,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,要进一步贯彻“双百”方针;要调动江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;要发表不同题材、不同风格的作品;要批判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极左文艺路线;这些方面都很重要,都需要《雨花》把工作做好。但他认为,当前《雨花》的当务之急是给江苏文艺界最大的冤假错案“探求者”平反。拨乱反正首先要拨这个“乱”。他的想法得到庞瑞垠同志的大力支持。于是,顾尔镔同志要我写一篇社论公开为“探求者”平反。当时,在

邓小平、陈云同志的推动下,已开始对“文革”蒙冤负屈的著名老一辈革命家平反昭雪,但对“右派”提出平反,还是1979年下半年以后的事。中共江苏省委也正在做平反“文革”中冤假错案的工作,但还没有来得及给“探求者”平反。顾尔镔同志在1979年2月提出,率先给“探求者”平反,是有一定风险的。顾尔镔同志为什么要我起草这篇为“探求者”平反的社论呢?原来,我于1957年反“右派”斗争中被错划为“中右”(准右派),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,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,即在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。1960年,顾尔镔同志就是我的顶头上司,他在省作协办公室任主任。在两年多共事的时间里,他对我的历史和现实表现、实际思想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。他曾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过:“你的档案我全都看过了。你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批评(指我刊登于1957年3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上的《我对陈其通同志〈意见〉的意见》一文,已收入1997年11月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1949—1976文学理论卷》,“反右”时我因该文获罪,没有错。现在到你作协工作,仍要拿出批评陈其通等同志时的‘说大人则藐之’的气派来。我看你现在精神状态不振,‘夹着尾巴做人’。人活在世上,就得堂堂正正、气派派地活着,该说的就得说,该做的就得做,怎能‘夹着尾巴做人’?”顾尔镔同志的那次谈话,对我震动极大。从此以后,我力图改变自己,主动找工作做,主动对作协的工作提出建议,自己感觉又重新站立了起来。其后,我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任指导员,当顾尔镔、方之创作的话剧《江心》受到错误的批评,停排停演时,我和他对《江心》仍有共识:“不能什么题材都写阶级斗争!”“文革”后我调回《雨花》,他对我在《雨花》的理论活动是满意的,因此,他让我起草这篇

为“探求者”平反的社论,并鼓励我:“放开手来写,不要有什么顾虑!”庞瑞垠同志也说:“先拿出个初稿来,小样出来后我们再一起推敲。”

这样,我以一周的时间,从阅读当年有关“探求者”的资料和批判文章开始,逐步形成论点,最后写出了《探求无罪有错必纠》的为“探求者”平反的社论。全文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,肯定“探求者”在《启事》中主张:“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”。“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,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,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”,经过实践的检验,是正确的。第二部分,对“探求者”当时提出的艺术主张,认为“纯粹是艺术中的是非问题”,“我们应当通过自由讨论,通过艺术实践来解决这些是非问题。”“把‘探求者’的艺术主张和‘反党反社会主义’捆在一起,并以此定罪,是根本错误的。”社论的第三部分提出,“我们今天纠正和平反这个错案,不只是为‘探求者’恢复名誉,而且要从这一错案中吸取教训,不让这样的悲剧再在文艺界重演,从而促进文艺界的安定团结,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。”社论说:“‘探求者’的‘探求’无罪,这就是我们的结论。”顾尔镔同志、庞瑞垠同志在对草稿作了某些修改后,即在《雨花》1979年第4期公开发表了这篇题为《探求无罪有错必纠》的社论。

《雨花》对“探求者”的平反,产生了很大反响。人民大学书报复印社于1979年5月在《文艺理论》上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。多家文艺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。(按:“探求者”一案,1957年“反右”时,姚文元曾在《文艺报》上著文对“探求者”诬陷,成了文艺界“反右”时全国性的大案。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李进同志同意《雨花》杂志这一率先为“探求



者”平反的做法。中共江苏省委也很快下达了为“探求者”平反的红头文件。接着,省文联党组决定,除艾煊、叶至诚同志原已调回省文联工作外,又把“探求者”成员梅汝恺同志、高晓声同志、陈椿年同志调回省文联;建议南京市将方之同志调回南京市文联;建议苏州市将陆文夫同志调回苏州市文联;已在“文革”时去世的曾华同志,则在原单位平反昭雪。至此,“探求者”得到彻底平反。“探求者”成员在新时期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都作出了相应贡献。

事后,我问顾尔镔同志:省委还未给“探求者”平反,你怎么胆敢在《雨花》率先给“探求者”平反呢?他说:“我曾长久考虑,江苏文艺界拨乱反正,必须从为‘探求者’平反开始。这一大冤案不平反,拨乱反正云何哉?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省委作出决定后我们才动作,那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!思想解放,就得敢为天下先!”此言掷地可作金石声。

今后,谁要写《雨花》史,《雨花》率先给“探求者”平反一事,应写入《雨花》史。 陈辽

1980年到《雨花》当小说编辑的时候,我还是个未成家的年轻人,一晃已隔了二十七年。

我想我还是很适合当编辑的。

我喜欢看作品,文革学校停课,我就在家看了许多文学书,不管是革命的还是“黄色”的,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,不管是文学的还是文学理论的。我认为一个编辑重要的是鉴赏能力,提高鉴赏力只有看很多作品,这样才能对作品的整体结构有所比较,才能对作品细微的妙处有所发现。

我也喜欢写作品。进《雨花》之前,我发表了四篇小说,两篇发在《雨花》上,一篇发在《安徽文学》上,一篇发在《作品》上,都是短篇。那时刊物少,发作品的人也少,在县市一级,在报刊上发出一个短篇来,便被人们称为作家了,且作家的头衔很惹眼,而到现在,就是发表四部长篇,也很难当成编辑,也不会被人太当回事。我认为编辑还是应该能写作品,这样他对稿件作者的用心会更有体悟。

进了《雨花》,在前后任的主编顾尔镔、叶至诚的领导下,在前后任小说编辑组长李克因、李纪的指导下,我当了七年编辑,感受颇多,慢慢地发现要当好一个编辑还是很难的。

因各种机缘巧合,《雨

花》一度在全国文学界影响很大。不管是主编还是编辑,在一起时谈的主要是稿件,一旦发现了一篇好稿,也不管是主编还是编辑都很激动,会议论好长时间。那时还兴改稿,对要用的稿子,编辑一般都会提出一点意见,寄给作者,请他改后再寄来。而重点稿子,特别是头条稿,由编辑、编辑组长、主编拿出意见来,请作者到编辑部来改稿。我便接待过来改稿的赵本夫,那时《雨花》属于省文联,办公地点在省委党校里,赵本夫来就住在编辑部对面的党校招待所里,那一次见面后,延续了我们几十年的交情。

我曾在《雨花》分管苏北几个地区的稿子,后来又分管过外地的稿子。那时规定所有的稿件都必须回复,虽然有的回复是铅印信。我对文字好的稿件,还有构思较有意思的稿件就是不用,都会提笔回一封信,谈一下我的看法。我本身是一个创作者,知道作者看到编辑的亲笔信,总是很高兴的,对自己的心血有所慰藉。

那时我编过贾平凹、陈忠实等名家的稿子,贾平凹总无视稿纸的格子,字写得密密麻麻的,但整齐秀丽。我还因稿件,与胡玫与吴子牛多次联系,这些影视界的大腕,当初还在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学习,但才气已露。

在担任编辑的同时,我发了不少作品,有的作品经多家选刊选载,并改编成电视剧与戏剧,在文学界多少有了一定的影响,差不多全国的文学刊物都曾来约过稿。我清楚,几年的编辑工作对我的创作是极有好处的,我对作品的见识广了,也深了。

七年之间有两年多,我去了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,与全国一批冒尖的青年作家成为同学,这期间,我的作品写得多了,编的稿子也不少,毕竟有同学的支持。

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回来,很快我就调进了专业创作组。调之前,后任主编的周桐淦对我说,你留编辑部帮我吧,也不会影响你创作。我很感谢他的好意,但专业创作对我来说,曾是一个最大的梦想,我一个劲地朝着梦想奔去了。

然而编辑又何尝不是我多少年中的梦? 储福金

据世界报业协会公布

《现代快报》位居全球 37 名

世界百强

而今迈步从头

越快,越深度 | 南京首创杂志化大容量封面报道

越快,越及时 | 南京首创报网联动, 获取最新资讯

越快,越实在 | 财经报道和上海证券报同步, 劫后股海一帆风顺

24小时读者热线: 96060

http://www.lifenanjing.com.cn

现代快报

Modern Express

讲真话 办实事 树正气

现代快报